



尊重事实

尊重逻辑

尊重理性



声音 (第二辑)

我们不谈真理

柴 静 邵 建 等著
史仲文 王 俊

GE 声音

我们不谈真理

(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GE 声音:我们不谈真理. 第二辑/柴静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
ISBN 978 - 7 - 5087 - 3483 - 5

I. ①G... II. ①柴... III. ①高等学校—素质教育—文集
IV. ①G64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4794 号

书 名: GE 声音:我们不谈真理(第二辑)
著 者: 柴 静 邵 建 史仲文 王 俊 等
责任编辑: 尤永弘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编辑部电话: (010)66078402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51713
(010)66051698 (010)66063678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8.5
字 数: 253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序

本书是《GE 声音：我们不谈真理》的第二辑，与第一辑出版相隔约 3 个月时间。出版状况如此良好，全赖于网友和读者的认同与支持。

本书付梓之前，我想说说“GE 声音”作者的一些书写信念。

第一，坚守批判精神。人们常说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能否成为社会的良心，一个最紧要的检验标志就是具备不具备批判精神。批判精神不是如昔日搞政治运动那样，批判谁就是要打倒谁。打倒不是批判，正如辱骂和威吓不是战斗一样。批判的过程是一种求知的过程、探索的过程，用波普尔的话讲，批判就是证伪。证明哪些东西是虚假的、伪善的、丑陋的与有害的，因此，批判没有特定的界限与特定的对象。那些选择性批判、预定性批判和限制性批判其实都是伪批判。真的批判一定是有事实作依据的或者实验结果做支撑的或者思辨逻辑做基础的。 $1 + 1 = 2$ ，狂风骤雨之下它也等于 2，风和日丽之中它还等于 2，就是遭遇了 18 级台风，九级以上地震，它仍然等于 2。这样的事实就是上帝也无法改变的。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是能够坚守住这事实，并且把它表述出来。这样的声音也就是我们所认可和追求的声音。

第二，坚守专业精神。“GE 声音”的本意是讲通识教育的，为什么要强调专业精神？因为二者不可以对立。通识教育的第一诉求当然是做人，但也不排除对人的能力的培养。现代文明的专业化要求非常高，可以说没有专业背景终将一事难成。过去我们听说美国的律师非常之多，认为那是一种巨大的社会浪费。现在我们知道，在一个法制化充分发展的时代，没有律师的专业性帮助，我们甚至无法运用这些法律来保护自己。遗憾的是，在这个特别需要专业的时代，我们中国内地的很多专家常常处于一种无声的状态。有多少经济问题困扰着中国人，但我们很难听到经济学家的专业性见解；有多少道德问题

困扰着中国人,但我们很难听到伦理学家的专业性见解;有多少环境问题困扰着中国人,但我们很难听到环保专家的专业性见解;有多少卫生保健问题困扰着中国人,但我们很难听到卫生医疗专家的专业性见解;有多少教育问题困扰着中国人,但我们很难听到教育专家的专业性见解;有多少交通问题困扰着中国人,但我们很难听到交通专家的专业性见解。我们不知道这些专家都到哪儿去了?其中的很多人可能自认为就生活在象牙塔中,然而照我的见解,象牙塔里的人也要吃饭,也会生病,也必然产生垃圾,这些问题除非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是一样也无法回避的。我真的非常希望中国的专家能够站出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标准、专业判断与专业胆识有效地为这个社会尽心,为这个时代服务。我知道本人的专长有限,但我的自我期许是:纵然我们不能达到达尔文那样的专业程度,那么干脆就做赫胥黎一样的专业捍卫者好了。

第三,坚守自律精神。自律其实就是自重。在尊重与自重之间显然有着一一种内在的联系。以中国的传统论,文字书写原本是一件神圣的事情;以现代文明论,文字书写是一件需要认真负责的事情。博文虽短,贵在真实,我认为我们每一位“GE 声音”的作者都应该也必须对我们所坚持的每一个观点负责;对我们所引证的每一个事实负责;对我们所书写的每一个文字与符号负责。我们坚决反对和鄙视那些抄袭、变相抄袭以及一切虚假现象。在这里,我不揣冒昧地代表我们如今在线的 61 位“GE 声音”作者向一直关爱着我们的网友们宣示,但有此类行为,即刻除名——责任人自动失去作为“GE 声音”同仁的资格。

而今为士何所有?

良知、逻辑与清白。

我们不谈真理,但完全可以成为干净的读书人。

史仲文

2010 年 11 月 8 日

记于北方工业大学素质教育与现代文化研究所

目 录

序	史仲文(1)
---------	--------

世事直评

龙阳君与若众:哥玩的是什么	王永忠(3)
扫黄、肉体政治学与福柯	王永忠(7)
为地震局正名	王志刚(11)
走向封闭的中国社会	王 俊(12)
蜗居与笼屋的情绪区别	史仲文(14)
我们为什么爱“流氓”	史仲文(16)
透过张悟本这个怪诞的镜像我们还能看到什么	史仲文(20)
我们为什么爱饭桶	赵玉琦(23)
万一火了呢	赵 强(25)
我们为什么爱侠客	张 轶(28)
戾气与中和	赵丽华(31)

崔永元说	柴 静(33)
应该感谢炒红犀利哥的低俗草根们	黑 马(38)
千万别听杨澜给穷学生支的招儿	黑 马(40)
杨澜和潘石屹的姿态为何如此不同	黑 马(42)
论指向弱者的报复	曹瑞涛(45)
红包、制度及其他	曹瑞涛(47)

学术博议

教师与狗	王永忠(51)
高等教育去行政化应该从哪儿着手	史仲文(53)
汪晖抄袭所引起的联想	史仲文(56)
汪晖唐骏现象之五大怪	史仲文(59)
我想做一只良心未泯的蛆	史仲文(63)
谁能对《红楼梦》进行同行评议	汤剑波(66)
唐骏在中国与唐骏在美国	修木读史(68)
学术的边界	何中华(71)
大学校园不能流失公民教育	邵 建(81)
儒学民间化比官方弘扬更活力	邵 建(84)
江山代有才人出 ——从又红又专到有本事靠得住	陈 锐(87)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陈高华(89)
土豆论青椒	赵 强(94)
真的假博士与假的真博士 ——新克莱登大学与方鸿渐的两支血脉	黑 马(97)

公民建言

被精神病与权力的疯狂	王 俊(101)
人民代表,怎么代表	史仲文(103)
对人民代表的五项提问及联想	史仲文(107)
做事儿的官员哪里去了	史仲文(110)
国富民穷,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史仲文(113)
政协的话语权是什么权	邵 建(116)
两会代表的公共知识令人遗憾	邵 建(119)
评扰乱信访秩序罪	邵 建(122)
法律正义缺位,自然正义血腥	邵 建(124)
什么叫依法维权	邵 建(127)
用公民称谓人民	邵 建(130)
一个人的言论是否可以违宪	邵 建(133)
政府站中间,工会站左边	曹瑞涛(136)
国界为自由而生,也将为自由而死	熊培云(138)

漫话世界杯

《影武者》与被点杀的日本队	王永忠(143)
别让权力绑架了足球	王永忠(147)
可以做球迷,不可以做主宰	
——布拉特警告法国国会的启示	史仲文(151)
最江湖的一届世界杯	张 轶(154)
世界杯是属于天才们的	张 轶(157)

文化杂谈

从“广场鸽”到“刘文彩”	王文革(161)
单向度的人与房奴	
——重读马尔库塞	王永忠(165)
山寨版刺客列传序	王永忠(168)
从马屁精到犬儒	王 俊(170)
从非诚勿扰节目看世道人心	王 俊(173)
更无一个是男儿	王维民(177)
“中国站起来”:我想躺着	史仲文(186)
虽然世俗,中国人的内心情感同样圣洁	史仲文(188)
唐山大地震:我所期待的道歉和思考	史仲文(191)
启蒙时代的转折	修木读史(194)
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	
——《且听风吟》读后	许 波(199)
《野草》中的佛教与启蒙	张 典(201)
尼采哲学的演化	张 典(205)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张 典(214)
五四是一个划时代	邵 建(227)
今天这个社会谁最拜金	邵 建(234)
共和的专制和民主的专制	邵 建(237)
骂了后会怎样	
——对《略论五四运动与启蒙》的通俗解读	陈 锐(240)
黄侃与钱玄同:谁在抄袭	赵玉琦(243)
假装我已离开	
——残酷青春的守望者	赵晓辉(246)

台湾电影的黑道情结与青春记忆	赵晓辉(251)
国外剩女类影视剧的解读	赵晓辉(256)
西方文化视野中的上海形象	赵晓辉(261)
在自由与权威的冲突中寻找协调	柴 静(267)
文学翻译是奢侈的 ——我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黑 马(272)
广场精神的萎缩	曹瑞涛(276)
后 记	张 轶(282)

世事直评

龙阳君与若众：哥玩的是什么

王永忠

同性恋在“酷儿理论”(见李银河《酷儿理论》)的指导之下,在世界各地乘着后现代的翅膀渐成燎原之势,并一路高歌猛进,成为多种文艺形式的重要题材。作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对此种风口浪尖的最 in 的 fashion,自不甘人后。《诗经》自然进行重新解读,而传统典籍中也不乏精彩记述。《战国策·魏策》中的记载如下: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余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王曰:“然则何为涕出?”曰:“臣为王之所得鱼矣。”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始得鱼也,臣甚喜,后得又益大,今臣直欲弃臣前之所得鱼也。今以臣凶恶,而得为王拂枕席。今臣爵至人君,走人于庭,辟人于途。四海之内,美人亦甚多矣,闻臣之得幸于王也,必褰裳而趋王。臣亦犹曩臣之前所得鱼也,臣亦将弃矣,臣安能无涕出乎?”魏王曰:“误!有是心也,何不相告也?”于是布令于四境之内曰:“有敢言美人者族。”

《周书》有言:“美男破志,美女破居。”破志利器就是史不绝书的“男风”,作为后宫和太监这些编制内的服务团队,美男则纯属“编外人员”,是否上岗、

有无待遇,纯粹取决于皇上或大王的个人取向以及皇恩浩荡。作为“男风”的先行者,龙阳君为后世的同行树立了不可逾越的成功典范,“哥玩的就是受宠”。在一个权力无限集中在一位爷身上、万千宠爱皆自一人出的社会结构之下,失宠的结局只能是大爷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韩非子·说难》就记述了卫灵公的男宠弥子瑕失宠后的严重后果:

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忘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赠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

因而,无论“共船而钓”、“断袖之欢”,抑或“安陵之好”、“窃驾分桃”——“受宠”还是“失宠”,这是一个问题(To be favored, or not to be favored, this is a question.)。得幸之时,私自挪用公车,吃剩的桃子给领导,都不是问题,然而,失宠之日,则秋后算账,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韩非子的建议是:“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一切视龙颜喜怒而定。性在日本被提及从来就不太关乎道德,而更多的是娱乐、责任。男风在历史上被提及虽不及吾国之历史久远,亦显别样之精彩纷呈。11世纪成书的《源氏物语》中常常提到男人被年轻英俊少年(即若众)所打动的情景。光源氏就拒绝了一名女子,而拉着她的弟弟侍寝。在寺庙中,方丈和寺僧普遍存在此种关系。事实上,寺庙僧人的男风如此之兴盛,甚至刚踏上日本土地不久的耶稣会士弗朗西斯·沙勿略就在1549年写道:“(佛教僧侣们)从事那些不为有悖自然之事,而并不否认,他们公开地承认此事。然而,此种罪恶如此众人皆知,又如此显而易见,无

论男女老幼对此都司空见惯，众人对此既不忧心忡忡，亦无恐惧害怕。”^①

男风在日本历史迎来其“黄金时代”是在江户时代（1600—1868年），首先长期日本武士集团中存在的遮遮掩掩的同性恋开始盛行，并出现了所谓“若众道”（若众道，亦称“众道”）。现如今，日本社会除了使用汉字“同性爱者”指代同志之外，其他词汇多与国际接轨，例如ゲイ（gay，男同志），ホモセクシュアル（homosexual，同性恋的假名），レズ、レズビアン（女同志的 lesbian 假名）以及ホモ（homo，homosexual 的缩写），这些都是最常见的术语。若众意指年轻男子，在江户时代指的是尚未举行成年礼的少年。这时男子的发式是若众发，额发不剃，剃除顶发后扎上结发带；有些未婚少女也会结成这种发式。武士间同性恋的发生往往在一个年长者和一个若众之间，或者两个若众之间（如日本电影《御法度》描绘的那种暧昧关系）。与此同时，文艺界亦不甘示弱。歌舞伎作为町人市井文化的代表在江户时代受到普遍欢迎。最初的表演团体是游女歌舞伎（ゆうじょかぶき），游女即日本古时的娼妓，依照外貌与技艺素质的高低分为许多等级。江户时代初期，由于歌舞伎表演盛行，许多游女亦模仿演出，并常有借机卖淫的情事。1629年开始，德川幕府（日本）为了净化社会风气，下令禁止女性演出歌舞伎，取而代之的是若众歌舞伎（わかしゅかぶき）。由于女歌舞伎遭到禁止，便开始由貌似女子的“若众”来担任表演工作。与女歌舞伎相同，这些若众向雇主提供文化娱乐的同时，也免不了将“男风”活动商业化，1652年开始，表面上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德川幕府再次下令，禁止少年男性演出歌舞伎。此后，活跃在舞台上的就是那些野郎歌舞伎（やろうかぶき），野郎意为男性，此处是“野郎头”的略称。野郎头是江户时代一般成年男子的发型，乃是将额发剃掉后，将中间的一撮头发向前结成半月的形状，野郎歌舞伎是在若众歌舞伎被禁以后所产生的歌舞伎形态，由蓄着野郎头的男性来担任表演工作。由男性演员演出的传统维持至今，并成为歌舞伎的一大特色。这些“老男人”表演的节目尚差强人意，要让那些爷对他们有什么想法，则另当

① 见 Leupp, Gary P. (1997). *Male Colors: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in Tokugawa Japa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11。

别论。如此一来,幕府也就认为社会风气已经得以整饬,不用再担心什么歪风邪气了。然而,那些退役的若众歌舞伎,却在另一种职业上找到了上岗的机会,此岗位名为“阴间(阴间,字面意思是隐藏的房间)”,即主要向男性客人提供服务的男妓,其活动场所被称为“阴间茶屋”,其实就是提供色情服务的茶楼。此外,町人市井中的饭店、酒肆、茶楼、戏院的老板,也名义上雇佣一些若众为伙计,此种活动非但没有禁止,反而愈演愈烈。幕府将军的良苦用心彻底泡汤,人们的兴趣从争夺舞台的角,转入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哥玩的就是娱乐。”

扫黄、肉体政治学与福柯

王永忠

福柯对肉体与权力—知识的关系研究,成就了他的微观社会学的基础。深入探讨了人类历史所出现的死刑、拷问、苦役、流放、鞭刑、示众和公开认罪之后,福柯创造了“肉体政治学(body politics)”这个术语,福柯“把它看做是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则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①。“文革”期间对“地、富、反、坏、右”的斗争,将暴力直接加诸到斗争对象的身体之上,充分展示了权力对肉体的征服。每一次的批斗都转变为一场盛大的仪式,坏分子被反绑着双手、头戴着写着侮辱性标语的高帽,在群众义愤填膺的口号、唾弃声和纷纷落下的拳头之中出场,低垂着头,等待那象征正义的对肉体的判决。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或多或少还残留一些对此种场面的记忆,酷刑历来就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有差别的痛苦制造方式,一种标明受刑者和体现惩罚权力的有组织的仪式。

我们历来都有搞运动的传统,运动一到,打击的对象必然玉石俱焚、灰飞烟灭。入夏一来,随着世界杯期间北京的天上人间被查处之后,神州各地展开了扫黄专项行动,西安、南京、南宁、昆明、青岛等等各地警方和有关部门重拳

^①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0页。